



一份执著，一份眷恋；一种信念，一种姿态

精神的年轮



Thirty Years

www.fudanpress.com.cn

雷 颐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Thirty Years

精神的年轮

雷 颐◎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神的年轮/雷颐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
(“三十年集”系列丛书)
ISBN 978-7-309-07773-5

I. 精… II. 雷…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1897号

精神的年轮

雷 颐 著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陈 军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5 字数 233 千

201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07773-5/C·177

定价: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雷頔

以历史研究为业,往往会有“我们缘何需要集体记忆”的“自疑”与“他问”。其实,集体与个人一样,当丧失了集体记忆时,就会“错乱”。因此过去的痛苦与欣悦、辉煌与衰败、光荣与罪过都应该铭刻在集体记忆中,只有记住历史,才能面对未来。一位俄罗斯历史学家写道,在俄国面临的大变动中,俄罗斯人民了解历史的热情空前高涨,因为人们认为俄国在20世纪几次影响人类命运的巨变,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与俄国历史有着紧密的内在关系。在俄国的启蒙思想传统中,文学一直起着特殊的作用,而现在,“历史”则取而代之,“在文学止步的地方,由历史学家撰写的随笔和论文展开了接力赛”。或许,有人会强调应当忘记过去,面向未来。但正如一位波兰历史学家所说:“关注未来不能被视同愿意忘却。决不应该认为忘却通向社会和平的通行证。记忆是国内和平的组成部分。”因为有记忆,个人和集体才会对自己的过错、罪孽忏悔,才可能不重蹈覆辙;而且受害者才有可能原谅、宽恕迫害者。忘记过去,并不能带来和谐。而健忘的集体,总会不断地重复错误、罪孽,难以自拔;人类社会也将陷入“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悲剧循环之中。

保持真切的集体记忆并不容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有人伦品目焉”。由此可见,在中国的主流观念中,历史一直有着崇高甚至近于神圣的位置。“春秋笔法”也是中国文人在政治高压下指陈时弊的惯常手法,因此历代统治者对历史的写法也就极其敏感,要垄断历史的话语权。历朝历代,都要花官帑无数,修出“钦定”的“历史”,即人为地规范集体应记住什么、忘却什么。

这种“钦定历史”,必然形成巨大的集体记忆空白,为伪造、涂抹历史提供了可能。历史能如此轻易地被忘却、被涂抹,着实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三四十年前我们经历过的那场“浩劫”,不正在迅速被遗忘、被涂上一层“浪漫”的玫瑰色吗?这说明,主流话语对人们遗忘什么、记忆什么的掌控力之强。迟早,人们将为这种

“健忘症”付出代价。长久以来,人们总说中国文化是“历史的”。然而,现在的中国文化却很难再说是“历史的”了。因为“昨天”刚刚过去,就迅速开始遗忘过程;不用多久,有关“昨天”的记忆可能就会成为忘得干干净净的“白茫茫一片大地”。或许邓拓先生早就看到此点,所以在四十好几几年前竟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呼吁要“专治‘健忘症’”。

“健忘”形成的一个重要“学理”原因是“唯文本”阅读。当研究一个历史人物、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历史运动时,往往将某个历史人物的公开言论、自我表白,有关事件的宣言、主张、纲领等“文本”信以为真。殊不知,公开的“文本”与真实的“历史”,往往相距甚远,有时甚至完全相反。而且,每个社会,每个时代或多或少都会有各不相同的“禁忌”;对一些事件、人物在一定时空内的“书写”往往“只能这样”、“只能那样”。而学者往往也会有自己的“偏爱”或“偏恶”,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无论是人物、事件还是思想体系,可能有意无意地会或者“隐恶扬善”或者“隐善扬恶”;对某种思想往往根据“文本”便阐发、叠加、附会了越来越纷繁、丰富、精巧、华美、恢宏的意义。这一切,都使“文本”留下了更加巨大的空白。然而,后来者往往容易唯文本是信,对“钦定”的“记忆规范”和书写者的主观好恶形成的这种空白,缺乏应有的认识。

我也是经过二十多年的历史研究并“结合”自己曾经下乡、当兵、当工人的生活经历,才逐渐认识此点。有一番阅历后,对自己青春年少时读过的某一本书、某一段文字,当年深感艰涩难懂,现在顿感原来简明易懂;当年认为无关紧要,现在才知原来至关重要。而这种要警惕“空白”、“空乏”的观点,前人早有深刻论述,自己也早就读过,只是当年未能理解、体会罢了。

大学时代,我对“当代外国哲学”深感兴趣,自然要读到当代法国“结构主义”大师、“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阿尔都塞。当时,他的著作并未翻译过来,只有一些介绍、评析文章,在这些文章中,第一次知道了他的“症候阅读法”。“症候阅读法”是他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在阅读中把所读文章中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并且使之与另一篇文章发生联系,而这另一篇文章作为“不出现”存在于前一篇文章中。这种阅读方法不相信看得见的东西,即书本上的白纸黑字都是不值得相信的“表面文章”,而真实的东西往往是“不可见的”,往往表现为“匮乏”和“缺席”,必须从作者的文本的“症候”入手,从字里行间读出空白、犹豫与沉默。对此

高论,当时我“费尽心机”仍感一头雾水,也就似懂非懂,不了了之了。

如果说“当代外国哲学”是我的课外兴趣,那“中国古代思想史”就是不得不学的专业课了。当读到明末清初学风丕变,以黄宗羲为宗祖的浙东学派坚决主张“言性命者必究于史”,钱大昕强调以读史来救治当时学风之弊,对长期的“经”、“史”两分强烈不满,章学诚进而提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盈天地间,凡涉著述之林,皆是史学”、“圣如孔子,言为天铎,犹且不以空言制胜,况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等等论述时,我并未理解其中大有深意,反不无轻慢地以为短钉琐屑。

或许,只有岁月才能使人理解深刻。这些年,我对“唯文本是信”的荒诞与危险感觉越来越强烈,认为越来越严重的“唯文本”阅读,是当前值得重视、应当警惕的“学风”之一。这种“纯文本”阐释舍去历史,通篇都是最新潮最时髦的“学术话语”,以此歪曲历史使之符合“理论”。而“趋新若鹜”的青年学子,格外容易被其震住、唬住、迷住,不知不觉便戴着这种“有色眼镜”看待历史与现实。因此我经常不厌其烦、不惮重复地写文章提出要透过“文本”,要看到“文本”之后的历史实在,指出“纯文本阐释”有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历史研究,就是要能够发现“空白”,然后“填空”。这时,三十年前读过、当时并未理解、几乎已被忘记的“症候阅读法”突然浮现脑际。阿尔都塞早就这样写道:“要看见那些看不见的东西,要看见那些‘失察的东西’,要在充斥着的话语中辩论出缺乏的东西,在充满文字的文本中发现空白的地方,我们需要某种完全不同于直接注视的方式,这是一种新的、有信息的注视,是由视域的转变而对正在起作用的视野的思考产生出来的。”道理简单而深刻。同时,同样几乎被我忘记的“浙东学派”也重新浮现出来,真正体会到他们对“不切人事”、“离事而言理”这种貌似短钉的“学术批评”和对“史”的强调,其实饱含着历经一个王朝覆灭劫后余生者的椎心泣血之痛!

历史是对过去的记忆。米兰·昆德拉强调,对过去记忆的丧失,将使“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这便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原因所在。摆脱历史记忆,生命将变得毫无意义。而千千万万无辜的死难者,将被历史迅速遗忘,最多化为“历史教科书”上一小段无足轻重的文字或几个干瘪枯燥的数字。虽然知道历

史必然有大量“空白”因此有填不完的“空”，但“知其不可而为之”，尽量不让历史“留白”、尽可能为历史“填空”，就更是历史学家，不，应是所有人的责任。借用董桥先生在“一袭真切的民族记忆”中的比喻，千千万万个人点点滴滴记忆的“寻寻觅觅补补缀缀”，图的是缝补成中国人的“公共记忆”，“尽管只是百衲衣上的半截袖子、一幅下摆”，毕竟渗出了岁月流逝中“民族的体温和体味”。只有更多的人，无论是在历史大潮中或曾引领潮流或曾力挽狂澜的“精英”，还是任大浪裹挟、只能随波升沉起伏的“庸众”，都写下自己的“昨天”，参与“历史记忆”的形成，打破“钦定”历史话语的垄断，我们才能“最后补成一袭金缕玉衣那么真切的民族记忆”。“昨天”如果连飞鸿雪泥都不曾留下就白白逝去，终归令人遗憾，人们确应以自己的心血文字与遗忘抗争。

是为序。

目 录

自序 / 1

一九七八—一九八一

辛亥革命前夕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 / 2

十月革命的启示 / 14

一九八二—一九八四

从冯桂芬到郑观应——洋务思想家试析 / 20

一九八五—一九八九

传统文化的“虚文”与“实利” / 31

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五四时期对传统伦理批判的再认识 / 34

从“科玄之争”看“五四”后科学思潮与人本思潮的冲突 / 37

论五四爱国精神 / 52

一九九〇—一九九一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境——30年代民主与专制论战透视 / 58

傅斯年思想矛盾试析 / 70

“出山要比在山清”——漫话丁文江 / 87

一九九二—一九九四

文人还会被尊敬么? / 92

一九九五—一九九七

背景与错位——也谈中国的“后殖民”与“后现代” / 98

“白”与“黑”——伊朗的两种“革命” / 103

警惕“真理” / 110

“洋泾浜学风”举凡 / 115

今天非常“法兰克福”——对一种“理论透支”的分析 / 122

一九九八—二〇〇〇

“日常生活”的历史 / 127

义和团的悲剧 / 136

“天国”悲剧 / 141

警惕法西斯 / 148

二〇〇一—二〇〇六

泪为谁流——海涅的一次心灵震荡 / 157

“无社会”的悲剧——“巴格达之劫”的联想 / 162

“拯救美国”的“扒粪运动” / 165

“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与“后殖民主义” / 171

“后现代批评”与“中国国情” / 180

扶贫的根本是给农民“国民待遇” / 185

二〇〇七—二〇一〇

测谎器的哲学原理 / 188

“声音”故事 / 193

清廷“制造”革命党 / 199

“万岁”故事 / 203

有关“太阳”的故事 / 211

尊孔背后的历史隐喻 / 216

附录一：“阅读社会”与我的思想启蒙 / 221

附录二：雷颐主要著述简表 / 226

一九七八—一九八一

纪事

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1年大学三年级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辛亥革命前夕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这原是大二结束时“中国近代史”课程的“学年论文”,没想到得到任课老师李时岳先生激赏,推荐参加秋天吉林省史学会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与会者中,只有我是大学生,这篇文章收入会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这篇论文,可以说是我的“学术生涯”的起点,也某种程度地改变了我的专业志向——此前,我是一心想研究世界史、准备考世界史专业研究生的。对这个题目的研究、这篇文章的发表,使我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决心研究中国近代史、决定考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生了。在写这篇文章时,我惊讶地发现,我们当时“激动人心”地讨论的许多问题,如人道主义、个人主义、人的个性的解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甚至存在主义,辛亥革命前的思想界已经讨论过了。其水平,甚至高于我们,不禁感叹中国“历史的轮回”,感叹这些在现实中仍是“敏感问题”。另外,可能我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这时期以人道主义为原则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开了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之先河”这一观点的。这篇文章的文风,也反映出自己长期读马克思、黑格尔那种欧化、排比句的影响,当然,文锋笔意中带有一种“一去不返”的青春的激情。

《十月革命的启示》虽然发表于1989年,但“成文”却是在1981年末,“世界现代史”课程结束,考试就是每人写篇论文。几年后,我一字未改将此文送《史学理论》编辑部,不久,就一字未改发表。这篇文章,反映了80年代初期“南斯拉夫共产党理论”、“瓦尔加遗言”、布哈林、捷克斯洛伐克“第三条道路”、“欧洲共产主义”等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所理解的)对“苏联模式”的批判对我的影响。这些理论,为中国改革提供了最早的理论依据。当时,许多著名的学者、理论家和青年学生,大都是从此中获取批判旧体制的理论、思想资源的。毕竟,它们早几十年就开始了“对苏联模式”的反思。这篇文章仅以几千字来“宏论”改变人类命运的“十月革命”,也只有“年轻”才有此勇气。如今,早无作此种“宏大叙事”的勇气了。

辛亥革命前夕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

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必然要引起人本身的深刻革命，即人的思维方式、认识手段、价值观念的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说，又是革命的人推动了社会的革命。辛亥革命前夕的中国资产阶级，无论是革命派、改良派，还是无政府主义者，在变革客观世界的同时变革着主观世界，即人本身的革命。他们师承欧洲前辈的人道主义思想，使这一在欧洲已奄奄一息的火炬在 20 世纪初年暗昧的中国发出耀眼的理性之光。

一

这里所说的人道主义，是指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资产阶级反封建、反宗教，要求个性解放，强调天赋人权的政治思想运动，即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当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 14 世纪的意大利各城邦萌芽并要求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它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光就预示了蒙昧黑暗的中世纪的尽头。束缚、禁锢人的神学，压制、限制人的各种封建特权，农奴制、行会制的人身依附关系等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价值规律、等价交换原则、劳动力的自由买卖格格不入，严重地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充满信心与力量的资产阶级要从封建关系下解放出发展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劳动力，首先要把劳动力从封建社会的支柱——贬低否定人的宗教神学的迷雾中解放出来。于是，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思想，即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在意大利发祥。

新兴的资产阶级对自己、对人类、对未来充满信心。但丁高声宣告：“人的高贵，就其许许多多的成果而言，超过了天使的高贵。”古希腊哲学家的一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成为这时人们的座右铭。许多传统用来表现《圣经》故事的艺术形式开始表现、歌颂世俗生活，甚至把圣母描绘成为有血有肉的人间妇女。既然人比神高贵、人的力量大于神的力量，那么人的特性、人的欲望也就是高贵的而不是可卑的。所以，人应该充分发挥个性、尽情享受现世的幸福，而不应该压抑个性，僵化性灵，为彼岸的幸福而抛弃此岸的幸福。18 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启蒙学者

与战斗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进一步把人道主义发展为天赋人权、人性本善以及环境决定人的思想理论。既然天赋每个人以平等的权利与义务,那么君主专制就是不合理的;既然人性本善,使人变坏的是环境,那么要使人变善首先要改变社会环境。这种革命思想的直接产物就是天翻地覆的法国大革命。天赋人权思想的主要代表、《社会契约论》的作者卢梭的遗骸被革命者迁入先贤祠。这次革命的纲领《人权宣言》具体地体现了人道主义的思想。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成为社会存在的一种并对社会发生某种程度的影响。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启蒙的人道主义思想,理所当然地在 20 世纪初年中国资产阶级的心中引起一种天然感应。他们继承这一优秀遗产并将其作为同中国封建统治思想斗争的批判的武器。

二

随着帝国主义用暴力打开封闭的中国市场,传统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然经济遭到无情的破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在中国发展起来,从而产生了中国资产阶级——当时中国最先进的阶级。从 1872 年到 1894 年这 22 年中,中国资本主义新式工业先后开设了近百家,资本额共 2 000 万元;从 1895 年到 1904 年这十年中新设厂矿 168 家,资本额共 3. 397 1 亿元;从 1905 年到 1911 年,新设厂矿 322 家,资本额共 7. 734 2 亿元。甚至从来官办比重最大的煤矿业在 1905 年到 1911 年间商办资本已占总额的 52%,超过了官办资本^①。可以看出,中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迅速增长,日益壮大。与之相应的是产生了一大批与过去封建士大夫迥然不同的受过西方教育和影响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他们将作为资产阶级的喉舌去宣传、鼓动一次革命;与之不相应的是,封建专制统治紧紧地束缚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仍然作为社会的统治意识形态,僵化的思想造成思想的僵化。这样,新生的中国资产阶级在用火与剑攻击旧世界,为自己生存开辟道路的同时,还要用笔和舌批判旧世界的不合理性,并为自己的合理性辩护。这样,一场在人们内心世界掀起巨大风暴、根植于社会经济物质生活中的思想革命的发生就不可避免了。

三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形成了一整套系统严密,与封建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相适应,以儒学绝对忠孝为支柱的封建意识形态结构。每个人都不是独立的个人,而是在君臣父子夫妻关系之中,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站在金字塔顶端的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全社会都在他的脚下绝对忠于他。他不仅支配人们的生和死,还要支配人们的想和说;他一个人否定了其他所有的人。人的欲望是邪恶的,应“存天理,灭人欲”,应无欲无望地做统治者得心应手的工具。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哪里君主制的原则占优势,哪里的人就占少数;哪里君主制的原则是天经地义的,哪里就根本没有人了。”^②

哀莫大于心死。与否定人的原则相反,为了唤醒每个自我的觉知,意识到自己存在的价值,“除心中之奴隶”,资产阶级根据人道主义思想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今日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为我也,利己也,中国古意以为恶德者也。是果恶德乎?”“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立而立者也。……故人而无利己之思想者,则必放弃其权利,弛擲其责任,而终至于无以自立”。“盖西国政治之基础在于民权,而民权之巩固由于国民竞争权利寸步不肯稍让。即以人人不拔一毫之心,以自利者利天下。观于此,然后知中国人号称利己心重者,实则非真利己也。苟其真利己,何以他人剥夺己之权利,握制己之生命,而恬然安之,恬然让之,曾不以为意也”。^③他们认为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一反中国轻视个人、抹杀个性的传统,大力提倡被视为大逆不道的个人主义,摘去人们心中的锁链,启发人们为做一个真正的人而战斗。他们甚至还从中国古代哲学中为个人主义找出论据,“昔中国杨朱以为我立教,曰:‘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吾昔甚疑其言,甚恶其言”^④,而今却认为:“一部分之权利,合之即为全体之权利;一私人之权利思想,积之即为一国家之权利思想。故欲养成此思想,必自个人始。人之皆不肯损一毫,则亦谁复敢攫他人之锋而损其一毫者,故曰天下治矣,非虚言也。”^⑤激进的革命派刊物《浙江潮》大声疾呼:“自私自利一念,磅礴郁积于人人之脑灵、之心胸,宁为自由死,必不肯生息于异种

人压制之下为之力也。可爱哉私也！西语曰：‘人生之大患，莫不患于不自助而望人之助我，不自利而望人之利我。’”^⑥显然，他们提倡的并不是通常所认为的那种鼠目寸光、唯利是图的消极的个人主义，而是提倡一种广阔深远、把个人利益与国家民族前途联系起来的生气勃勃的积极的进取精神。请看，梁启超这样认为：“故今日救国之策，惟有提倡独立。人人各断绝倚赖，如孤军陷重围，以人自为战之心，作背城借一之举，庶可扫拔以往数千年奴性之壁垒，可以脱离此后四百兆奴种之沉沦。”^⑦革命派更干脆地说：“佛郎西革命之精神，一言以蔽之曰：个人之自觉尔。”^⑧一种深刻的内在精神力量蕴含在这些文章中，激励人们充满信心地追求一个合乎人性的社会。

什么，居然提倡卑劣的个人主义？！面对这种责难，决心心荐轩辕的青年鲁迅激烈辩驳道：“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务引以为大诟，苟被其溢，与民贼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意也欤？夷考其实，至不然矣。……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既知自我，则顿识个性之价值；加以往之习惯坠地，崇信荡摇，则自觉之精神，自一转而为极端之主我。且社会民主之倾向，势亦大张，凡个人者，即社会一分子，夷隆实陷，是为指归，使天下人人归于一，社会之内，荡无高卑。”^⑨认为：“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事故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中国在昔，尚物质而疾天才矣……个人之性，剥夺无余。”^⑩提出“非物质”“重个人”。他们面对苦难深重的人民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将为传统所压抑、束缚、掩盖的东西解放、展现、裸露出来，笔耕着荒芜的心田，造就觉醒的自我为实现自己的价值而奋斗。基于现实斗争的需要，他们甚至从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中汲取力量。蔑视群众，鼓吹“超人”哲学的唯意志论哲学家尼采，骄傲地认为“只有最孤独的人才是最强有力的人”的戏剧家易卜生，都曾经给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极大的精神力量。他们服膺尼采的学说，推崇易卜生的思想，力图最大地振奋人的精神。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流行欧美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学说也被介绍进来。鲁迅写道：“丹麦哲人契尔开迦尔（按：即克尔凯郭尔）则愤发疾呼，谓惟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而顾瞻他事，胥无益焉。”^⑪这些在西方已腐朽的哲学意想不到地在腐朽的中国放出一线光芒，在中国特定的条件下起了进步的作用。因为这种学说某种程度地适合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促使人们由自在者变成自为者，由消极者变成积极者，由被动者变成

主动者。所以在辛亥革命中功勋卓著的实干家宋教仁说：“欲尝思及‘上天下地’，‘唯我独尊’二话，欲以‘唯我’二字当之。”^⑩当然，热衷折服于这种蔑视群众的哲学正反应了资产阶级对群众的蔑视，他们没看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因而出现了一些毫不犹豫地以个人生命去殉事业的苍白的英雄，诚然感人，却带有一抹绝望的悲剧色彩。今天，人们似乎有理由指责他们信仰宣传了错误荒谬甚至腐朽反动的思想，因为在阶级社会中没有抽象的人性，个性解放要受阶级和历史的局限并具有资产阶级的虚伪性……但还是列宁说得好：“在运动处于新的转变的时候，理论上的荒谬往往会包含某种实际的真理。”^⑪

觉醒的、充满理性精神活生生的自我必然要与传统的封建纲常名教发生激烈冲突，衰朽的偶像在强迫人们向他膜拜，死人压迫着活人，觉醒的资产阶级终于喊出了“谋人类之独立，必自无圣始”^⑫这一激动人心的口号，公开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几千年来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他们根据自然人性论，认为，“吾心中之有理与欲，如磁极中之有南与北，如电性之有阴与阳”，^⑬揭穿统治者“以为公者天理也，私者人欲也，理欲战于中，往往天败而人胜，于是乃借克己复礼之说，穿凿而附会之，谓欲复天理者，必克人欲”。提出自己的人生观：“人生观之最终目的何在耶？……人生观概要二：曰身体之快乐，曰精神之快乐。”^⑭“天生人即与之应有之幸福”^⑮，人们应该勇敢地追求幸福，这就否定了禁欲主义，否定了否定人的“天理”，否定的否定就是肯定，肯定了现实的人。必须看到，这种认为追求官能享受，趋乐避苦就是人性本质的说法并不科学。名闻遐迩的思想家章太炎就据此错误地认为劳动不是人的本性，“曰劳动为人之天性，是则为诬天性者”，“动者，人之天性；劳者，非人之天性”^⑯。其实，恰恰是劳动把人与一般动物区别开来。动物只能适应自然，人却改造自然。人是自然的产物，又作为唯一能改造自然的高级动物与自然分离、对立。但从根本上说人仍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的能动表现形式，这种能动性就是人类为生存而获得物质资料的劳动实践活动。因此，劳动是人有意地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自由、自主的活动。劳动作为需要正是人的本质中最主要的方面，只是私有制的出现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从而与劳动产品及劳动活动本身相异化，劳动由第一需要变为迫不得已的谋生手段。人与劳动的对立正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在不可能有科学的世界观指导下，章太炎等把人的本质的异化、扭曲当做真正、纯粹的人的本质并不足怪。

既然所有人追求幸福的权力是天赋的，那么男女必然就是平等的。他们同情

地看到妇女处在社会的最低层饱尝苦难,于是满腔悲愤地《哀女界》,兴起《女子家庭革命说》,尖锐地《论中国女学不兴之害》^①,要“铸造国民之母”。他们认为:“男女同生天地间,同有天赋之权利,同有争存之能力。”^②勇敢地提出婚姻自由这一被道学先生认为是万恶之首的敏感问题,“终之以婚姻自由,为吾国最大问题,而必为将来发达女权之所自始”^③。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把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紧紧联系在一起,“女权与民权,为直接之关系,而非有离二之问题”,“能去压制始长爱情”^④。如果说恩格斯认为妇女解放的程度标志着社会解放的程度,那么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程度就标志着社会思想解放的程度。

可以说,社会思想解放的程度此时达到前所未有的阶段,他们激烈批判孔孟之道,三纲五常等封建思想体系。“仁之实为事亲,义之实为从兄,胥此道也,则犯上作乱之事息矣;礼以缚民身,乐以和民气,胥此道也,则人人自由之言息矣。”^⑤他们沉重地叹息:“异哉夫支那,乃有所谓三纲以钳缚其臣民,钳缚其子弟,钳缚其妇女,何栽培奴性若此其深也!”^⑥他们意识到:“有天然之道德,有人为之道德。天然之道德,根于心理,自由平等博爱是也;人为之道德,原于习惯,纲常名教是也。天然之道德,真道德也;人为之道德,伪道德也。”“中国数千年相传之道德,皆伪道德,非真道德也。”^⑦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列为宗教迷信,把人人平等、父子平等、男女平等列为科学真理。他们指责孔子“在周朝时候虽是很好,但是在如今看起来,也是很坏”^⑧。“孔子为中国文章之匠宗,而束缚人心,至于如此”^⑨。甚至连温文尔雅的饮冰室主人也讷讷地反驳那位他所敬重但一心尊孔保教的南海康老师:“居今日诸学日新、思潮横溢之时代,而犹以保教为尊孔子,斯亦不可以乎!”“保教妨思想自由,是本论之最大目的也。”^⑩可以说,这时期以人道主义为原则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开了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之先河。

四

独立的个人必然要求平等的权利,只有平等的权利才能保证个人的独立。要求“天赋”的平等权利是人道主义的另一重要内容。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天赋人权”思想引起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强烈共鸣。“凡人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

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时乃非人。”^④在封建专制压迫下的中国人民没有任何权利，“以故吾中国四万万人，无一可称完人者”^⑤。他们热情地喊出人们的心声：“人人有应得之权利，人人有应尽之义务。”^⑥对平等权利的要求必成为反对封建政权的更直接的政治斗争。

马克思说过：“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⑦自由、平等、博爱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为了“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革命派、改良派及无政府主义者在这面旗帜下组成了一个庞大的交响乐队，奏出旋律与节奏不同但却扣人心弦的乐章。改良派认为：“天生人而赋之以权利，且赋之以扩充此权利之智识，保护此权之能力。”^⑧革命派也认为：“自由、平等、博爱之者，人类之普通性也。”^⑨“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⑩无政府主义者同样认为：“吾人确信人类有三大权：一曰平等权，二曰独立权，三曰自由权。”^⑪而章太炎甚至要把佛教的华严、法相二宗改造成宣传平等思想，反对专制压迫的武器：“殊不知得，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的东西必要除去，满洲政府待我汉人种种不平，岂不应该攘逐”，“其余经论，王贼两项，都是并举。所以佛是王子，出家为僧，他看做王就与做贼一样，这更与恢复民权的话相合”^⑫。这样说未免有些荒谬，但也说明他们对平等的真诚向往。应该承认，在这一时期关于人道主义的理论宣传中，梁启超作出了不同凡响的贡献。他具体地提出了政治、宗教、民族、生计等四大自由，并认为“生计上之自由者，资本家与劳动者，相互而保其自由也”。“凡劳动力者，自食其力，地主与资本家，不得以奴隶蓄之。是贫民对于素封者所征得自由也”^⑬。他热情地讴歌“于戏，灿哉自由之神！”^⑭亨利希·海涅说过：“一个天才的笔，向来是比他本人伟大的，它要远远扩张到它的暂时目的以外去。”的确，梁启超的生花妙笔超越了他本人，这支点燃人们心中火焰的笔使他的文章有着一种感人的力量，一种他本人似乎未觉察的风暴在他的文章内聚集云涌，这种精神的风暴一旦解放出来将释放使他本人惊骇不已的物质力量。

从人人平等的思想中必然得出民族平等的思想。反满，是近代中国反抗清朝统治压迫的一个富有鼓动性的口号。但此时的反满不同于以往的民族主义，就在于他们为这一口号注入了“民族平等”的内容。他们多次强调：“夫排满洲即排强种矣，排清主即排王权矣。”^⑮“然吾固非主张种族主义者，又非不排满者。满人之平民可不排，而满人之官吏则必不能不排。不特此也，汉人中之在政府，其朋比为